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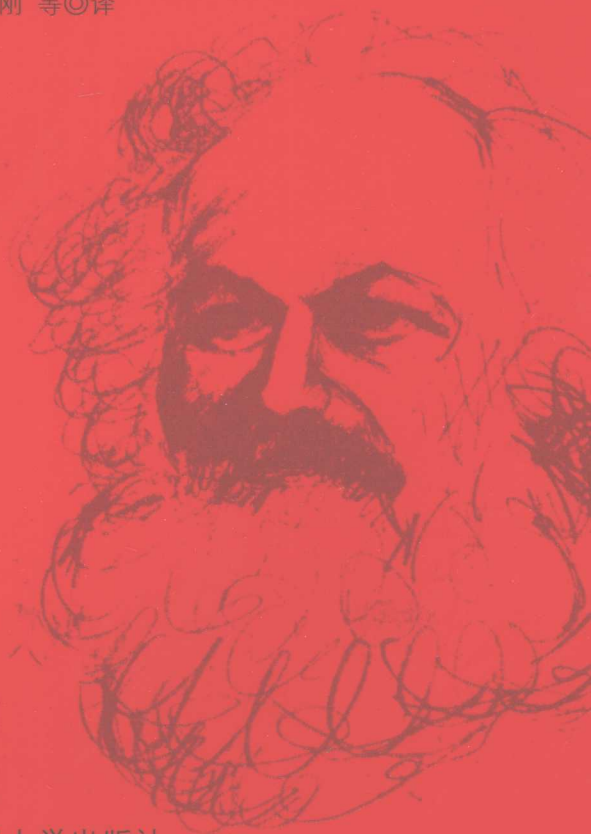


AGAINST
CAPITALISM

反对资本主义

[美]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著

李智 陈志刚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GAINST CAPITALISM

反对资本主义

[美]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著

李智 陈志刚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对资本主义/[美]戴维·施韦卡特著;李智,陈志刚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9179-2

I. 反…

II. ①施…②李…③陈…

III. ①社会主义经济-研究②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 F04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4830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反对资本主义

[美]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著

李智 陈志刚 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22.75 插页 2

字 数 403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

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它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中文版序

《反对资本主义》是在1989年至1991年间那个多事之秋的氛围下撰写的，其间，经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坦率地说，当时，中国并不在我的慎重考虑之列。

十多年前，我已开始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那个原本要成为我学术生涯的核心问题上：如果像马克思所坚信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工艺上的成就真的已经为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直接飞跃到这个完全属人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这其间的过渡社会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都知道，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没有明言。他倒是作出了不少提示性的表述，但没有提供一幅蓝图，哪怕一幅粗线条的草图也没有。当然，我不能因此而批判他。作为一位十足的科学家，他是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去冥想他不可能证明的那些东西的。当时，毕竟没有证据，还没有人从事过任何这样的社会实验。

但如今，就过渡问题而言，情形会是怎样的呢？真的就存在着这样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经济上明显充满活力、很大程度上会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经济吗？应该说，迄今还没有这样一种十全十美的社会，还没有这样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也还没有这样一个日子比我们过得好得多的社会。我的问题是——30年前是、今天仍然是——凭目前我们自身的情形以及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我们能否有某种信心宣称：存在这样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性社会，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它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性能还要优越？

到1980年,我就得出了结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起码从理论上讲,在经济方面和在伦理方面都比资本主义要优越。但这种社会主义并非当时那种主导着世界的社会主义形式,它并非苏联模式的翻版。我早就断言: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必须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的社会主义。^[1]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解体不应该使人惊惶失措。我从来就不是中央集权的信徒,而我所探求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来就定位在苏联模式的尖锐对立面。然而,解体确实引起了一片恐慌,因为在当时,遭到断然否定的不仅仅是苏联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已普遍地认为,苏联式的指令性经济模式存在着深刻的弊病,起码有必要把某些市场的成分引入到这种体制中,以便使它变得更有效率。东欧大部分国家,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苏联,都在经历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自1978年以来,中国也在进行市场导向的巨大改革,但市场机制在东欧引入得更早,也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因此,我一直对此密切关注)。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进展。在这一部分世界里,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民主的、有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秩序——似乎正在孕育当中,就基本形式而言,它正符合我分析和倡导了十余年的那种模式。

然而,情形似乎并非如此。东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结束,不仅仅包含传统的苏联模式,还有那些同样有着市场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实验。当时,并不明朗的是,为什么会如此?在本来有更为理性的措施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为什么偏要采用那些如此明显地被误解为所谓“休克疗法”的计划?当然,这其中,西方——尤其是美国,也有西欧国家——强制性冲开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门户,剥夺它们最有价值的资产,斩除它们所有社会主义的因子,最为要命的是,摧毁了那个关于企业可以由它的工人民主地管理的危险理念。^[2]但是,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些国家,如此众多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这其中,有最为杰出的——为何如此迅速地否弃了他们过去的理论,而全身心地接受资本主义的复辟?比方说,像詹诺斯·科尔奈(Janos Kornai)这样有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怎么会这般写道:“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企图产生出一种不自洽的体制:公有制的统治与市场的运作是不兼容的。”还有,怎么会说,工人自我管理“是改革进程的一大死结”^[3]?

显然,我得反思我的论证。于是,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反思证实了我原初的结论。随着我最初的考察和研究不断地拓展,不断累积起来的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证据一直是在强化——而

不是削弱——我的那个论断，即有一种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样式。东欧和苏联的进展绝没有使此断言失效。

稍加反思，我们就能看到：东欧那些如此快地拥抱亲资本主义议程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既没有道德上的人格，也缺乏知性上的自信心，没法抗拒来自西方一流学府里著名经济学家所策划的政策，这些政策当然得到了美国和西欧政治和财政实力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言所出自的科尔奈那本冗长的、灰暗的书曾获斯隆基金、福特基金和麦当娜基金的全额资助。其中许多内容是他任哈佛大学期间写就的，在那里，他应邀自1984年定期在“休克疗法”的设计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所在的那个系讲学。

我决定把这本新书命名为《反对资本主义》，以此来强调一个事实，它是与当时凯歌高奏的亲资本主义情形针锋相对的。书名所提示的只是，本书是批判性的，是对资本主义消极性特征的一个概览，而实际上，本书的核心是对积极的替代性社会的一种阐明和辩护。很久以来，我就意识到，替资本主义辩护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是被称为“TINA”的说法，即“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要反驳这个论据，就不得不展示出一个替代者来——我在这本书里就这么做了，并称此替代者为“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

在《反对资本主义》出版十年后的今天，事态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我认为，这本书主要的论证已经确立得相当牢靠了。事实上，我刚出版了另一本书，它再次替“经济民主”的基本模式作了辩护，再次更新了论据，只是这一次用的是不那么专业、而更贴近人的基调。^[4]在过去的十年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很少有支持资本主义的迹象。恰恰相反，继苏联瓦解时的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子之后，资本主义兴高采烈的情绪一落千丈。

还是想想当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所作的允诺和预言吧，他们曾信心百倍地断定：

俄罗斯和其他前社会主义社会在短期内就会变成兴旺发达的、在主流上是社会民主的社会。

剩余的那几个尚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将很快步东欧社会主义的后尘，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号。

社会上的富国，由于不再负担像冷战期间那样大规模的军备，会利用它们的专业技术和部分财富扶持穷国去赢得由资本主义所（自恃能够）推动的增长和发展。

一个全球性经济稳定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一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将开启。

再来思量一下现实吧：

——东欧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进行的巨大实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在许多场合，甚至遭受灭顶之灾。那些如此确信企业家精神和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会因此兴旺起来的所谓专家都已犯傻，多数人已销声匿迹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共产党政府——中国、越南、老挝、朝鲜或古巴——崩溃了，也没有任何这样的政府放弃他们的社会主义“遗产”（至少在形式上）。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极度贫困的人群和极度贫困的国家的数量继续在攀升。^[5]在后冷战时代，在穷国当中，还没有取得资本主义成功的例子。

——世界经济在重重危机中举步维艰，在内部金融精英圈子里，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引起恐慌。自冷战结束后，我们已经经历了墨西哥的“龙舌兰酒危机（tequila crisis）”、东亚的破产、俄罗斯的负债，还有巴西那场难以遏制的危机和如今发生在阿根廷的金融混乱。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停滞不前，欧洲也意识到自身难以应付最高纪录的失业率，美国——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当下——股市正在下挫，卷走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中大量的钱是普通老百姓的养老金。

——就世界和平而言：美国和它诸多的盟国投入到反伊拉克、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的战争。如果当前的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它很可能马上又会陷入与伊拉克的战争中。在此期间，在非洲，一直发生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为，还有众多军事武装起来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已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因而越发变得有攻击性和破坏性了。

本书所阐明的“经济民主”理论同近来世界局势的进展是完全相吻合的。这些进展进一步证实了其中最基本的一个论点，那就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存在深层次缺陷的经济制度，完全不可能解决目前那些挑战人性的基本问题。事情的真相是，在过去十年间，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其体制运作的自由，而事态已变得更糟（而不是好转）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看来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然而，仍待追问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充满活力的替代性社会呢？

本书的论证得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还有一些东西没来得及在本书中强调，我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某些实实在在的力量，对在此所阐明和辩护的替代者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倘若我们真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界定的那种有创造性的、讲究实际的、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倘若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无论在此处，还是在别处，一种沿着这里的理论所提示的路线走

下去的经济重构行动迟早会加以尝试。

中国会是担此重任的地方吗？显然，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关头。它到底要走哪条道路，这对中国自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后果和影响都将是深远的。把问题提得更尖锐点：1978年开始的改革进程会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达到极限吗？或者说，它会放任某些力量在可预见的将来就把国家瓦解掉吗（如同俄罗斯改革所做的那样）？或者说，它会仍然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创造出某些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成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刚从杭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赶回来，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之路”。在会上，有众多的中国与国外学者——包括好几位曾是高级官员、现已退休的人士——直接就上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作了重要陈述的有：

来自海外的（除我本人外）：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第三世界论坛，塞内加尔，达喀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新左翼评论》编辑），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新左翼评论》编委会成员），阿米雅·巴格奇（Amiya Bagchi，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加尔各答），约瑟夫·佛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和崔之元（新加坡国立大学）。

三位离任的知名官员是：杜润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和朱厚泽（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发言人还有：秦晖（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读书》杂志主编），温铁军（《中国改革报》总编），胡祖刚（杭州商学院院长），曲万文（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副所长）。^[6]

对我而言，靠一次学术讨论会、一次短暂的访问，就对中国的发展作出某种判决性的断言，可能是轻率和失当的。不过，我还是想通过提供几点对中国的印象来结束这篇献给中文版的“序言”。我不是中国学者，但透过本书所发展出来的这面理论透镜，我一直关注中国好些时日了。

《反对资本主义》是逆意识形态潮流而写的。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似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真要走这条路（追随资本主义），其客观制约因素也是很强大的，它们会不断激发出抵抗的力量。这些制约因素有三方面：

物质条件：很显然，“融入主流”，如果这意味着或多或少的经济私有化，而又不能增加国家对社会的民主调控，那么它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而最大的可能是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有：

大规模的失业、地区间和个人间的不平等与环境恶化。

意识形态：在某些群体中，无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的“效忠”有多少水分，一个仍然存在的事实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这些价值观念必须纳入慎重考虑之列，其旨归是替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不是退回到中央集权，而是一种承认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权利、同时认可国家对投资的重要调控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些价值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正如本书所阐明的）。

阶级（阶层）斗争：阶级（阶层）斗争，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任何尚未克服匮乏问题的社会（除了最原始的社会）所共有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当然是对的。自然地，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个体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普遍性利益，并且，只要有可能，他们就竭力加以推进。中国的情形当然是这样的。如今，中国有一个为数不多、但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阶层），他们会不断开拓，寻求自身的利益。但这绝不能推导出一个先定的结论，即这些人的利益要超越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当然，这也有可能，但如果因此导致阶级（阶层）斗争公开化，那么，可能带来的或是一损俱损、同归于尽；或有可能达成某种富有创意的阶级（阶层）妥协，并因此而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7]

应该记起的是，领导者并不总是得到了他们认为正在得到的东西——即便在他们成功之时。正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许多法国革命的领袖原以为，他们是在再造一个罗马共和国，而实际上他们在缔造的是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难设想，那些自认为在把中国纳入“主流”的人，事实上，是在把自身融入到孕育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阶段性进程中，而这个经济组织形式将被证明为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

如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兴，带来的后果又会是怎样的呢？鉴于我们对本书所展示的理论的理解，凭借历史经验的证实，我们能够有把握地预测到：

- 稳步攀升的失业率；
- 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不断升级的地区紧张；
-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伴随而来的社会动荡；
- 生活在永久性贫困和绝境中的人口数量的激增；
- 不断加剧的生态灾难；
- 一个非政治化的公民，瞬间就成了种族或宗教煽情下的牺牲品，变得放浪形骸、麻木不仁。

这样的前景是可能的，当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迥异的未来是可设想的。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作这样

的预测当然是基于另外的理由。即便有朝一日中国的 GDP 赶超美国（这当然是可能的），其人均收入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目前就已享有的水平。要知道，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态系统本来就不能够支撑这样高的消费层次。既然人类的繁荣并不以奢侈性消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沉溺于其中）为必要前提，接受相对落后这个事实并不残酷。

中国在军事实力上也超越不了美国。差距如此之大，因而也不值得费心力去弥合。可见，这也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如同苏联所认识到的，军备竞赛只会耗尽自己；也如同美国正在意识到的，在现代世界，军事霸权算不了什么。如今，美国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趾高气扬，但美国公民的生活质量肯定不比 1989—1991 年苏联东欧剧变事件之前要高，也不会更幸福。恰恰相反，现在是浸在恐怖主义的恐惧中，止不住要紧张地发问：“他们为何要这般仇视我们？”

如果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 21 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完善一种真正民主的、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所要求（起码是）的某些机制，那么，“中国案例”将比苏联案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毕竟维持了半个世纪）要鼓舞人心得多。地球上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发展战略，而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处处担惊受怕的工人，也该竭尽全力、迫切要求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的、民主的经济制度，即所谓德国特色、法国特色、意大利特色、瑞典特色、英国特色、日本特色或美国特色等的市场社会主义。

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之路，还是让所有斗争着的阶层都陷入俄罗斯式的深渊里——这些都是处于这个历史时刻的中国所可能面临的前景。我毕竟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什么预言家，我不会费劲去预测中国这场正在进行的阶层竞争的大结局。我们所能希望的是，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真实而持久的利益必将战胜一切。

戴维·施韦卡特

2002 年 8 月 5 日于芝加哥

[注释]

[1] 关于这个主题，在我的第一本书《资本主义还是工人管理？——一种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评判》（*Capitalism or Worker Control?: An Eth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 New York: Praeger, 1980）中有所讨论。

[2] 就这一时期详细的描述，参见彼得·高文（Peter Gowen）：《全球游戏：华盛顿

争夺对世界的统治》(*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尤其是第九章。

[3] 詹诺斯·科尔奈：《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500、469页。

[4] 戴维·施韦卡特:《资本主义之后》(*After Capitalism*,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5] 联合国报告指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自 1990 年的 60:1 扩大到 1997 年的 74:1。[《联合国发展规划，1999》(*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从 1987 年到 1999 年，每天靠一美元左右维持生计的人口数量增长了 25%。[《世界发展报告，199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9), p. 25.]

[6] 在此,我要向曹天予与林春致谢,他们组织了这次引起强烈反响的活动,“会议简报”将用中文发表,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的一份礼物,见曹天予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之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 对资本家在社会主义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分析,参见戴维·施韦卡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论题与共产主义的过渡》,见曹天予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之路》。

帕茨

帕茨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超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卡尔·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
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译者注]

前 言

毋庸讳言，这本书是逆潮流而写的。人人都知道，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我们也看到“讣告”了。著名哲学家、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说过：

对我们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得经历好长一段心理调适期，才可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光彩了。这个词所遭遇的命运，就像是其他许多的词，它们所拥有的光彩和力量都来自一个这样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是伸手可及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术语，就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种运行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看来是如何如何的。^[1]

“讣告”也许早产了。本书会证明罗蒂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一种运行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会是怎样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在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尽管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无相关，但并不能证实罗蒂及其他人所说的话。

本书要阐明一个更为有力的观点：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不仅富有生机活力，而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不再拥有一种有效的合理化证明，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伦理道德上的。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知识分子（西方出自左翼的分子和其他人）就应该停止伪称资本主义理应赢得我们对它的道德上的皈依。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眼下，我们之所以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除资本主义以外就不存在